



三十六计谋略解析全书

(第二分册)

主编 李玉安

副主编 杨兴哲

向继再



第二分册 敌战计——阴谋者胜

有之能生，在于示无；陈仓能度，在于有暗；火之能观，在于隔岸；刀之能藏，在于含笑；李能代桃，在于能僵；手能牵羊，在于顺势。故变有技，在于权宜、得适、顺势、巧饰而已。



引言

本书系《三十六计谋略解析全书》的第二分册，主要叙述三十六计中的第七计至第十二计，计名分别为：无中生有、暗度陈仓、隔岸观火、笑里藏刀、李代桃僵、顺手牵羊六计。统称“敌战计”。

所谓“敌战计”，关键是抗和拒，即抗战、拒战。也就是说，在双方或多方争战中，施用计谋的一方用生、渡、观、藏、代、牵等手法技巧，如何以虚掩实、以假掩真、终于获小利或大利的计谋。核心是以虚、假示人，而掩盖真、实的目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又有看准对象、掌握时机与玩弄的技巧问题。否则，一着不慎，全盘皆输，不仅难获其利，而且可能是人亡国破。若在政治争斗中，更会导致“机”（会）失人亡、敌胜己灭的恶果。

“无中生有”列于《敌战计》之首计，意在实施高超的政治手腕，迷敌、惑敌、惆敌、愚敌，制造将无说

有、以有说无的假象，但却又使政敌深信不疑为限度，再慢慢由假变真，无中生有，达到敌败而不释迷的目的。从字面言，“无中生有”的“无”，是假象，是欺骗，是迷惑对方的手段；而“有”，可解释为真、为实，是要获胜（胜的大小可视所处情势而定），是施此计的目的。暗度陈仓之计，与无中生有可属同一性质，又与声东击西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即有主动之意，而这一主动行动是在示对方以虚、以假的情况下进行的。“笑里藏刀”亦可归于此类，即使对方相信我方之无力，失去警惕，不采取任何行动，而我方趁机策划，积蓄力量，再攻其不备，获得胜利。“笑”是虚，是假，是手段，刀是真、是实，是目的。也就是外示柔弱、暗藏杀机。

“隔岸观火”、“顺手牵羊”，与上述三计不同之处在于非主动的主动。所谓非主动，意为获胜的条件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，而是以敌对的势力的变化而作用的。所谓主动，即一旦捕捉到对方有乱、有隙，便不失时机地从中获胜。这种胜不限大小，大胜大获，小胜上获，从而达到增强自己实力的目的。

李代桃僵之计的核心在于，根据敌对双方力量的消长，当须损失局部利益时，要忍疼割爱，以便换得更大的全局性的胜利，俗语说舍车保帅，其道理就在于此。

本册所收六计，一般他说，它是在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差无几，或此消彼长、此长彼消的变化不至于十分悬殊，抑或有多方之争中，相机而行，巧施其计，以达到进一步削弱敌对势力、自我壮大的目的。其中有相当复杂的变化，关键是对象、时机和技巧。否则，为人

所乘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若就敌战计实施的目的、性质而论，它的首要特征，便是其施计、行计、用计的机巧性。所谓机，既指时机、机遇，又指机会、机势。它是政治斗争中，诸多矛盾斗争形成的特定的态势，更是双方力量消长、对比中的暂时性错位与间隙。对它的认定、把握、衍化，则是变、化的决定条件。在此基础上，其生、渡、观、藏、代、牵则仅是变幻运用的政治技巧而已。其次，它的另一特色则是权变性。有之能生，在于示无；陈仓能度，在于有暗；火之能观，在于隔岸；刀之能藏，在于含笑；李能代桃，在于能僵；手能牵羊，在于顺势。故变有技，在于权宜、得适、顺势、巧饰而已。

目 录

第二分册 故战计——阴谋者胜

引 言 / 1
第 七 计 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意在栽赃陷害 / 1
第 八 计 暗度陈仓 明修栈道实欲乘虚而入 / 63
第 九 计 隔岸观火 坐观虎斗助之自相残杀 / 119
第 十 计 笑里藏刀 两面人物常为口蜜腹剑 / 181
第 十一 计 李代桃僵 势必有损定要弃小存大 / 233
第 十二 计 顺手牵羊 乘隙争利定取蝇头之利 / 283

第七计 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意在栽赃陷害

本计曰：“诳也，非诳也，实其所诳也。少阴，太阴，太阳。”其大意为：设法制造使敌方相信的假象，但不是弄假到底；掌握住由假变成真的转化，使蒙骗敌方的大大小小假象变成真象，由虚变实，达到自己的目标；以各种假象的伪装，掩盖着真象，造成敌方的判断错误，给对方以不意的攻击。诳者，欺骗、欺诈也。以空无伪装成实有，即是欺骗。“无”是不能打败敌人的，只有“有”才能击败敌人。但在“无”的时候，如何达到击败敌人的目的呢？这就要以假象来迷惑敌方，借助于诳。同时做到无中生有，由诳而真，变无为实有。少阴、太阴、太阳，意指要由虚假逐渐转变为真实，即所谓阴变阳来，阴极阳生，当大大小小的假象迷惑住敌方时，其时再施以出其不意的攻击，达到胜利，阳来也。

无中生有，《尉缭子·战权》载：“战权在乎道之所



极，有者无之，无者有之。”《老子本义·下篇》第34章载：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《诗法入门·诗论》载：“盖诗人怨叹，有实叙者，有过对指点者，有无中生有者”都是指在军事上的虚虚实实，由虚变实的欺骗之术。

秘本《三十六计》在无中生有之计的按语中，引用张巡草人借箭示虚，再派兵突营示实，当为本计的注脚。其事说的是唐代安史之乱叛将令狐潮率兵4万余包围雍丘（今河南杞县），雍丘守将张巡以为自己势单力薄，不能与之硬拼，便令士兵扎草人一千余，套上黑色衣服，用绳子拴住，趁夜色缒下城去。令狐潮的士兵以为城中出兵突袭，便争先恐后地放箭。结果，张巡不费吹灰之力，便轻易地得到数十万支箭。其后，又在夜间把士兵缒下城来，令狐潮的士兵以为是草人赚箭，看着大笑，不再放箭，也无战斗准备。于是，张巡就用此法缒下500多敢死之士，杀入令狐潮军营，焚毁营栅帐幕，令狐潮溃败逃跑，张巡军士追杀数十里，雍丘围解。

无中生有之计计文所说的：“少阴，太阴，太阳。”显系《周易》用语，即指四象中的三象。按其符号，当为上阴下阳，上下皆阴，上下皆阳。三象迭起为风雷益卦。益卦卦辞为：“益，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。”其意为，有利于前进，有利于涉过大河和艰难险阻，进行冒险行动。然而，益卦是将天地否卦的上卦减一阳爻，下卦增一阴爻而成，所以有两个对立的含义，即增益和损失。益则损，损则益，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。具体说

来，当获益时要谨防受损；未获益时，要设法以小损获大益。同时，少阴、太阴、太阳三象可代表施谋获益的三个步骤，阳代表真实，阴代表虚假。如少阴，意即当对敌方施以假象，目的在于使敌信以为真，继而发觉上当，此其一；其二，象征敌人的心态，即敌人信以为真，顿时紧张，予以攻击。但发觉上当之后，又陡然意志松懈。以为第一步骤。第二步骤：太阴，两个阴爻，意味着要连续不断地、反反复复地施敌人以假象，借以麻痹，使其失去戒备之心。第三步骤：太阳，两个阳爻，意即抛去虚假，显出真实，全力突击，彻底击败或消灭敌人。

本计用在军事上，是一种虚虚实实，由虚变实，迷惑敌人，攻击敌人的战术。即所谓的有者无之，无者有之之道，通过战场上的军事力量的虚实变化，造成敌方判断失误，然后再打败敌人。此计用在政治上，是指在与敌相拒的抗战中，善于发挥无中生有、有生于无之道，凭空生事，无事生端，凭空构造出令敌人被动的事端，然后再抓住战机，或陷敌方于死地而反快，或夺己欲夺之果实。

一、无中生有之计在政治斗争中的常用手法

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，为政治权谋的滋生和兴盛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和气候，权谋的应用和操作，成了政治角逐场上政治家、野心家、阴谋家们维护、巩固己方政治集团的权势和既得利益，排挤打击乃

至肉体消灭政治对手的法宝，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。无中生有之计，作为敌战计之首计，歹毒险恶、行之有效，更多地被集权的君主、官僚政客、阴谋家、野心家们作为惯用的伎俩使用，其常用手法主要有：

其一，凭空生事、捏造事实，制胜之计在其中。

在政治斗争中，政敌之间的为争权夺利，密切注意打探搜罗对手的情况，寻找政敌之破绽，抓住把柄，乘隙而攻，使对手陷于被动挨打，直至消亡，此类情况虽为常见，但在政敌对手无隙可钻、无机可乘的情况下，如何实现己方的政治目的呢？这就必须采取无中生有计谋之精华“造假”“制胜”，即凭空生事，捏造事实，编制可以攻败政敌的证据。常言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，加罪必有有“辞”，就“造假”“制胜”而言，其方法亦有多种：

招数1. 凭空诬指

一些在政坛之斗中处主动地位的君主、权臣、阴谋家，常常在了无事实的情况下，利用占据的权势和地位，无凭无据地诬指政治对手。

例一：刘腾、元叉无中生有害元怿。

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（公元520年），魏宫大太监刘腾、禁军统领元叉欲除政敌清河王元怿。元怿为北魏孝文帝的庶子，在任皇上孝明帝的叔父，当时裁门下省事务，作为皇族王公辅助垂帘听政的灵太后，及年幼的皇帝执政。元怿颇有才干，平时对刘腾、元叉两人皆有限制，至结怨仇。七月，元叉、刘腾私下密议，认为元怿辅政，已欲不张，早迟祸及自家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

但除去元怿，起事定当机密，只有采取欺骗办法，务必不让与元怿关系亲密的灵太后插手其事，而要以制造的假证据蒙骗年仅 11 岁的孝明帝，使其下诏定罪。同时，要行速决，防止朝官议谏，事体拖延，导致假证揭穿，务必一得手即行斩杀，况且元怿一死，既死无对证，届时即使有人谏议阻止，亦是枉然。两人议定，先由刘腾进宫，威逼手下专管皇帝饮食的太监中黄门胡定向及胡玄度，令其进诬言。胡定向、胡玄度畏惧刘腾威势，不得不从，立即向孝明帝禀报：“清河王令我俩在食物中下毒药以害死皇上，自立为帝，并许以成功后给予我们高官厚禄。”孝明帝年幼，初次听言，吓了一惊，也不去辨闻真伪，即信以为真，急匆匆跟随伪装前来护驾的元叉，奔至前宫显阳殿，此时刘腾早已利用总管大太监身份，令人封住宫内通道甬巷，垂帘听政的灵太后已被隔在后宫不得前来。刘腾、元叉乘此宣布：“孝明帝亲自执政，太后退帘，逮捕叛反的清河王。”恰巧元怿闻宫中有事，前来宫中打探究竟，进至含章殿，遇元叉拦住去路。元怿怒而责问：“你想造反吗？”元叉高声喊叫：“吾不造反，却要捕捉造反之人。”元怿听言，尚在疑惑，就见两边禁卫，一哄而上，把自己绑个结实。这边元叉拿住元怿，刘腾已经以孝明帝名义，集聚百官。刘腾平时在朝中为所欲为，为乱已久，不少王公亦投入其门下，连河间王元琛都拜刘腾为养父。一些忠直朝官，对刘稍有微辞，即遭逐杀。现在刘腾出面，又有元叉站在旁边，告元怿有谋反大罪，定为死刑，一时皆不敢发言，只有尚书仆射游肇站前抗争，认为此事应当谨

慎处理，戒草率决定。刘腾、元叉不容游肇再议，以百官名义，连忙启奏孝明帝，栽赃元怿“大道不轨，当斩杀”。孝明帝被骗，诏令批准，当天夜里，元怿在宫中被杀，时年34岁。

元怿被杀，是自北魏孝文帝时宦官干政以来，宦官和朝臣之间为争夺朝政的一场政争，中间又夹杂着元叉和元载两人之间的个人怨恨私仇，多种矛盾相互交织，加之垂帘的灵太后被刘腾监控失去自由，孝明帝年幼缺少主见，最后被刘腾、元叉从容使用无中生有之计，诬杀了富有才干的元怿。

刘腾，原是个靠告密起家的权阉，孝文帝时，因密告冯太后，迁中常侍、龙骧将军，再晋升大长秋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府卿，成为宫中的总管。延昌四年（515年），北魏宣武帝元恪病逝，皇太子元诩继位，是为孝明帝。灵太后由贵嫔被尊为皇太后，帘后听政。刘腾因在铲除权臣高肇势力之中，告密有功，被灵太后封为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，参与宫廷警卫，又任以崇训太仆，把太后所居的崇训宫一切事务交其全权处理。再另加侍中衔，位列门下省，参与朝中机要决策。不久又爵封长乐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五百户。晋迁卫将军，加仪同三司，成为北魏朝廷居中枢要位的权阉，一时间门庭若市，宫中外朝，宦官、朝官争相投其门下。刘腾等阉人的专权，引起了参与朝政的太尉、清河王元怿的不满。元怿身为皇族王公，不仅长得仪表伟岸，而且理政有方。同灵太后私人关系亦暧昧密切。灵太后听政后，放权让其理政，元怿也有心重整朝纲，不避权贵，甚至

连太后拜佛糜费过甚，他也直谏不辍。为此缘故，他与刘腾、元叉等人开始结下怨仇。

于忠是刘腾发动的密谋拔掉高肇，杀害高皇后，拥奉灵太后听政这场政变中的亲密合作伙伴，政变后，位居车骑大将军、崇训卫尉、尚书令，官至宰相，又总领皇宫宿卫。在朝中他与刘腾狼狈为奸，坏事干尽，经常假传圣旨，擅杀异己。元怿见其飞扬跋扈，为乱朝政，发动王公亲族，要求灵太后予以处置。又单独上奏疏，使于忠爵封被削，远调京城，于忠因此抑郁而亡。刘腾免死狐悲，从此忿恨于元怿，一直寻找机会，惩治元怿。

元叉出身皇族，又是灵太后的妹夫，灵太后上台后，官加至领军将军、位列门下省，又兼领宫廷禁兵，成为太后听政时皇族重臣，理应与元怿同心辅政，为振兴国政，做一番努力。但是元叉不思立功，反而恃宠骄横，四处勒民敛财，填塞自家腰包，元怿先对其劝戒，后见他无动于衷，就极力加以抑制，还依法把他降级使用，由此他对元怿也是衔恨胸怀。

刘腾、元叉，两人为对付共同的政敌，联手起来，策划于密室。他们的第一次阴谋，是买通曾被元怿看重，亲自推荐为通直郎的宋维，让宋维去诬告司染都尉韩文珠父子，说韩氏父子图谋叛反，准备拥戴清河王元怿出来即帝位。此事闹到灵太后面前，太后亲自审问拘留起来的元怿和其他相关人犯，虽多次刑审，却没有找出谋反的实证，事情只好草草收场，元怿被释放后官复原职，连诬告的宋维也只是贬官了事。于是，刘腾和元

叉又策划了本文开首的一段杰作。

刘腾、元叉的第二次诬告栽赃活动是成功的。其原因首先是诬告得人。由皇帝的膳食厨师作诬告人，假称是元怿让他们在皇帝的饮食中下毒药。皇帝还活着，说明毒药还没有下。但还没有下毒药，不代表不想、不打算下毒药，这个想打算的问题，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，了无实证的事，你说有它就有，你说无它就无。其次是欺骗对象选择得好，孝明帝是个11岁的孩子，听说叛反，只会跟元叉向前宫跑，哪有心思再仔细考虑刘腾、元叉所说的是否是事实，只能被其愚弄欺骗。刘腾、元叉在朝中又有势力，一个是权宦，一个是皇亲贵族，都是政权、军权集于一人，平时单手能遮天的人物，谁又敢与他们作对。即使个别人反对，也是难成气候。加上刘腾、元叉速斩元怿，想救也来不及了。能够辨识刘腾、元叉所说真伪的人是灵太后，可是灵太后此时是身不由己，已被刘腾等人控制软禁在后宫，元怿被杀，灵太后明白他是被诬杀，曾经伤心流泪过，但没有多少天，刘腾、元叉又以灵太后名义宣旨，太后决定敬逊别宫，退政归居，处于实际被废的地位。由此开始，元叉、刘腾执领北魏朝政，中间虽有灵太后的侄儿及张东渠等人谋杀元叉；中山王元熙、城阳王元徽等皇族起兵图谋执杀刘腾、元叉；右卫将军奚康生谋刺元叉等事件，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。直到孝昌元年（公元525年），灵太后才在一些王公大臣谋划下，复位出宫，再次临朝听政。

例二：固势力十常侍诬杀吕强。

西汉灵帝时，宠信张让、赵忠、夏恽、郭胜、孙璋、毕嵒、栗嵩、段珪、高望、张恭等宦官，灵帝先后封他们为中常侍职，掌管宫中文书，传达皇帝诏令，执掌要权。而张让、赵忠等人，利用灵帝贪色重财心理，为其在宫中建商业街，让灵帝和宫女、宦官扮成商贾，讨价还价，做市利买卖。又在西园建游乐场，招一班无赖子弟、陪灵帝玩狗驾驴，把朝中文官所带的帽子和绶带，戴在狗身上，又广收天下珍玩，进献给灵帝。甚至在宫中开办了一个官员交易所，把官职明码标价拍卖，谁出的价钱高，谁就可以做大官。十常侍靠谀语迎合手段，取悦皇上，把灵帝玩于掌上，而荒诞不经的灵帝，不以为嫌，甘愿被傀儡操纵，甚至公开对左右说：“张常侍就是我父亲，赵常侍就是我母亲。”灵帝认仆作父，自甘为子，如此推称，使十常侍恃宠跋扈，乘机大饱私囊，过上了骄奢淫逸，横行不法的帝王般生活。一次灵帝欲登长安宫的了望台，远眺皇宫四周景致。十常侍担心自家所建富比皇帝宫阙的府第被灵帝瞧见，就使人哄骗灵帝，说：“皇上是上天的儿子，不应当登高。皇上登上高处，百姓就会四散，这是不吉的兆头”，灵帝受骗，从此再也不敢居高而远眺了。

汉灵帝的昏聩，十常侍的为非作歹，引发了东汉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。灵帝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张角兄弟利用“太平道”，聚众起义。张角自封天公将军，其弟张宝、张樛封地公将军、人公将军，号召各地太平道教徒，头扎黄巾树旗造反。一时间，许多城池府第，相继失陷。洛阳亦为之震动。汉灵帝惊慌失措，匆忙令



大将军何进据兵镇守洛阳，以北中郎将卢植、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俊征讨“黄巾贼”。自恒帝以来因党锢之祸受逐杀失势的一些党人，也被启用起来，而且不少人在镇压“黄巾贼”的过程中立功受奖。反而一直受重视信用的宦官势力，中间出了个封谞、徐奉，与张角相互联络，图谋宫内外夹击，攻下京城洛阳。灵帝为此责怪十常侍，迫使张让、赵忠等人不得不收敛贪欲，纷纷召回过去安插在各地州县做官为将的父兄子弟，暂作退避之状。由此宦官赵忠等人迁怒于屡次劝谏灵帝的吕强，于是施行无中生有计谋，害死为人忠直，同任中常侍的吕强。

十常侍中的赵忠、夏恽，最先向吕强伸出魔爪。一天，他们乘灵帝退朝回宫，齐至灵帝前跪告：“中常侍吕强经常同党人聚在一起，议论朝政。还私下阅读《霍光传》，有废立之心。他们兄弟居官的，全都贪赃枉法。”灵帝不辨真伪，立即命令中黄门领兵捕拿吕强。吕强耿性刚直，难忍折辱，忿然明告“大丈夫要尽忠报国，怎能受狱吏审问。”说完引颈自杀。赵忠、夏恽未料吕强如此刚烈，急忙献言灵帝：“吕强还没有清楚召他问什么事情，就自我了结了，说明他确实犯有罪行，才致如此。”灵帝受赵忠唆使，又收捕了吕强的亲属等人，把他家的财产抄没入官。

吕强被赵忠、夏恽凭空诬陷害死，其原因，并非简单的同类人物之间的好恶嫉妒，实质内容，则是双方对灵帝执政以来的政策方针，有着巨大的分歧。究其大端，一是对党人的态度；二是对宦官势力专政的态度。

东汉自桓帝以来，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朝中士大夫与宦官之间互相冲突的党锢之祸。第一次是汉桓帝延熹九年（公元166年），朝中耿直大臣李膺、陈蕃、王畅等人，与京城太学生郭泰、贾彪等互通声气，他们对东汉以来的宦官干政现象深恶痛绝，必欲除恶务尽，他们互相推荐，评议时政、臧否人物，激浊扬清。同时对桓帝时的专权宦官侯览、张让等极力惩治打击。李膺为河南尹时，就要惩治与宦官紧密勾结，贪赃无数、声名狼藉的羊元群，结果反被诬陷。后来他做司隶校尉，带人到宦官张让家，杀死了躲在他家的弟弟张朔，因为他公开杀戮孕妇，虐人害物。洛阳人张成，恃着与宦官关系密切，指使儿子杀人报私仇。李膺不顾赦令，坚决杀死张成父子。结果，宦官指使张成的弟子牢脩，上书诬告李膺等人私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群生徒，结成党羽，诽谤朝政惑乱风俗。宦官们群起借势推波，桓帝不分皂白，把李膺等人下狱，定为“党人”，下令全国搜捕。范滂、杜密、陈寔等200多人都被下狱治罪，太尉陈蕃因反对拘捕党人，亦被灵帝免职，于是朝野内外，为之震悚缄口。直到次年，因为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用招供牵连宦官子弟、加上窦武等人为党人的上诉，二百多党人得以出狱见天，但是朝廷同时宣布：“党人遣回乡里，登记造册，书名三府，永远禁锢，再不得为官。”第二次党锢之祸，是比前一次更为惨烈的事件，灵帝于桓帝死后登基，年仅十二岁。窦太后临朝听政，其兄窦武为大将军，陈蕃晋升太傅，共同辅政。窦武接近朝中正直官僚和士人，征召李膺、杜密、尹勤等名贤，于灵帝建宁元